

故宫博物院 90 年陶瓷研究综述

Overview of the Ninety-year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eramic Objects
in the Palace Museum

孙悦

Sun Yue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博物院90年陶瓷研究综述

Overview of the Ninety-year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eramic Objects in the Palace Museum

孙悦

Sun Yue

内容提要:

古陶瓷研究是故宫博物院的传统优势，在国内外同行业中一直处于学科领先地位。值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之际，本文回顾90年来故宫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从陶瓷鉴定、陶瓷文化历史、窑址调查、陶瓷考古、陶瓷科技实验、陶瓷资料整理出版等几个方面，对故宫陶瓷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进行了总结论述。

关键词:

陶瓷 鉴定 考古 窑址调查 陶瓷科技

ABSTRACT:

The Palace Museum has long advantage in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eramic objects. It is ahead of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is discipline. In the wake of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ninety-yea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ceramics studies at the Palace Museum,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Museum's research of ceramic objects in terms of authentication,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survey of kiln sites, ceramics archaeology,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sorting and publishing of related resources.

KEYWORDS:

ceramics, authentication, archaeology, kiln sites survey,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ceramics

因拥有得天独厚的陶瓷藏品和享誉中外的专家学者，故宫博物院在古陶瓷研究领域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学术重镇。随着一代又一代知名学者、鉴定专家的加入和成长，故宫的古陶瓷研究不断拓宽领域、走向深入，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前沿地位。今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 90 周年，回顾故宫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正视历史，总结成果，查找不足，从中探寻陶瓷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对于陶瓷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亦有借鉴参考意义。

依照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同，本文从陶瓷鉴定、窑址调查、陶瓷考古、陶瓷科技实验、陶瓷文化历史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论述。

一 陶瓷鉴定学

鉴定真伪，是从事文物研究的基础，也是博物馆工作的优势和专长所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孙瀛洲、耿宝昌两位专家堪称陶瓷鉴定领域最高成就的代表。

孙瀛洲先生出身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古玩行业，对于古物的真伪鉴定有着丰富、直观的实践经验。其 1956 年入职故宫博物院以后，得以观摩故宫库藏的大量传世陶瓷真品，将自己早年的鉴定经验和宫廷收藏的官窑器物相结合，提升了自己的鉴定水准，也使得自己的鉴定经验得以理论化。其入职故宫的十年间，陆续写作了《谈哥汝二窑》¹、《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²、《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³、《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年款》⁴、《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⁵、《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⁶、《瓷器辨伪举例》⁷、《谈元明清瓷器的鉴定》⁸、《谈古月轩瓷器》⁹ 等文章。这些文章内容涉及宋元明清历朝瓷器，是孙先生晚年对于故宫文物整理、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其一生鉴定经验的总结。从文章题目不难看出，其研究重点偏重于文物鉴定方面，即从器物的造型、胎质、釉面、色彩等区别来论述鉴定要点，辨别真伪。这些论述文章，将原先被神秘化、玄学化的古陶瓷鉴定提升到理论层次。孙先生在行文之时，不自觉地现代类型学方法引入了瓷器鉴定的研究。这种与“学院派”殊途同归的研究方式，为科学鉴定在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逐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耿宝昌先生作为孙瀛洲弟子，与孙瀛洲有着类似的经历和成长环境。同是出身于古董行业，同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供职。两者的相似性也体现在学问的研究思路，都是以辨真伪、鉴优劣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其中，耿宝昌先生于 1993 年出版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¹⁰，是其鉴定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是书从造型、纹饰、胎釉、款识等基本要点及仿古作伪的手法等方面，系统讲述了从明代洪武至清代宣统时期 500 余年的陶瓷，是一部

1 孙瀛洲：《谈哥汝二窑》，《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 年 1 期。

2 孙瀛洲：《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文物》1963 年 1 期。

3 孙瀛洲：《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文物》1959 年 12 期。

4 孙瀛洲：《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 年总第 2 期。

5 孙瀛洲：《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文物》1959 年 6 期。

6 孙瀛洲：《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12 期。

7 孙瀛洲：《瓷器辨伪举例》，《文物》1963 年 6 期。

8 此为系列文章，自 1965 年始在《文物》杂志连载。

9 此为孙瀛洲先生遗作，未刊行。2008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孙瀛洲陶瓷研究与鉴定》一书中收录此文。

10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香港），1993 年。

最具权威的瓷器收藏鉴定指导书。这本书可以说有着垂范后世的影响。许多古陶瓷研究者，正是通过此书开始了古陶瓷鉴定的入门之路。

其后，故宫涌现出多位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陶瓷鉴定的专著。其研究方法大体是沿袭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一书的思路和内容，将之不断细化和深入。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叶佩兰《古瓷辨识》¹，王莉英《陶瓷器鉴赏与收藏》²，李辉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³、《青花瓷器鉴定》⁴，杨静荣《古陶瓷鉴识》⁵、《颜色釉陶瓷的鉴赏与鉴定》⁶，王健华《古瓷辩赏》⁷、《明代官窑瓷器识真》⁸，蔡毅《清代粉彩瓷识真》⁹、《明清斗彩瓷器识真》¹⁰、《中国陶瓷器真伪识别》¹¹、《明清单色釉瓷识真》¹²，吕成龙《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¹³、《中国古陶瓷款识》¹⁴，冯小琦、陈润民《明清青花瓷器》¹⁵，等等，都是作者在观摩大量故宫陶瓷珍品实物的基础上，对瓷器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研究。

二 陶瓷史研究

陶瓷生产的历史可谓湮远，但将陶瓷视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对其进行专项系统研究并最终形成完整的陶瓷史专著，则是近几十年的成果。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的陶瓷学者有着重要贡献。

故宫前辈学者陈万里是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便开始关注陶瓷历史。陈先生常常感慨，中国在上世界被誉为“瓷国”，然而“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¹⁶。为此，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投身于陶瓷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中。1937 年，吴仁敬、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¹⁷正式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陶瓷史专著，此书实有开山之功。然而，这部两三万字的小书对中国陶瓷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勾勒，内容多沿袭甚至照搬清末民国流行的文人笔记等杂录旧说，叙述不甚严谨，亦缺少考古资料的佐证。陈先生对此倍感失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¹⁸，也刺激了他本人研究陶瓷史的决心。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亲自大量调查古窑址和观摩传世品的基础上，陈万里写下《中国青瓷史略》一书，对浙

1 叶佩兰主编：《古瓷辨识》，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4 年。

2 王莉英：《陶瓷器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3 李辉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4 李辉柄：《青花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5 杨静荣：《古陶瓷鉴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杨静荣：《颜色釉陶瓷的鉴赏与鉴定》，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 年。

7 王健华：《古瓷辩赏》，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8 王健华：《明代官窑瓷器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 年。

9 蔡毅：《清代粉彩瓷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 年。

10 蔡毅、黄卫文：《明清斗彩瓷器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年。

11 蔡毅：《中国陶瓷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2 蔡毅：《明清单色釉瓷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 年。

13 吕成龙：《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14 吕成龙：《中国古陶瓷款识》，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15 冯小琦、陈润民：《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 年。

16 陈万里：《〈中国陶瓷史〉与〈景德镇瓷业史稿〉的批评》，《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 年。

17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

18 陈万里：《〈中国陶瓷史〉与〈景德镇瓷业史稿〉的批评》，《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 年。

江地区的越窑与龙泉窑青瓷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堪称陶瓷专门史的扛鼎之作。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硅酸盐学会（前身为中国陶学学会）牵头主编《中国陶瓷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专业领域组织编写的中国陶瓷通史。该项目的实际主持者，是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作为主编，冯先生将该书定位为中国陶瓷领域的第一部信史、通史，编写力求详尽完备。其本人亲自执笔该书宋辽金部分。他在该书中首次提出宋代瓷器按品种分为六个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南方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准确地概括了宋代瓷器的发展特点，这一理论已为古陶瓷学界广泛运用并加以发展。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古陶瓷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之后，故宫的陶瓷学者又陆续编撰了几部中国陶瓷史，如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¹，冯先铭《中国陶瓷》²等等。其中《中国陶瓷》一书，为国家文物局主持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之一，成为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籍，影响很大。

除了陶瓷通史的研究编纂，陶瓷专题史、断代史也是故宫学者关注的课题。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有冯先铭《龙泉青瓷》³、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⁴，叶佩兰《元代瓷器》⁵、刘兰华《清代陶瓷》⁶、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⁷、《中国古代官窑制度》⁸，刘伟《帝王与宫廷瓷器》⁹，等等。这些陶瓷断代史和专门史的著述成果，使中国陶瓷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陶瓷史，文献的搜集至关重要。而相对于卷帙浩繁的书画诗文论著，有关陶瓷类文物的文献资料难称丰富，且散见于各类地方志、历代实录、文人笔记等史料之中，杂芜零碎，常令研究者感到难以搜求，无从下手。这方面，故宫老一辈学者冯先铭、叶喆民等先生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功及后世。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¹⁰是这方面的集成之作。是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上相关陶瓷文献的记载汇集而成并加以注释、补充、论证，内容包括从唐代到民国时期有关陶瓷的文献，所涉书目有550余种、1130余条，整理分类为《说瓷窑》、《综论》、《说器物》、《说雕塑》、《说能工巧匠》、《说原料、青料》、《其它》七个部分，又附《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乾隆御题诗》等原始档案材料，详细列举各文献出处来源，并配以相关图版，为研究中国陶瓷必备参考用书。

三 外销瓷研究

不仅中国陶瓷，故宫学者也开始将研究视野拓广至海外陶瓷。这方面，以归国华侨、故宫前辈专家韩槐

1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

2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冯先铭：《龙泉青瓷》，文物出版社，1963年。

4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5 叶佩兰：《元代瓷器》，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

6 刘兰华：《清代陶瓷》，北方文物杂志社，1988年。

7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故宫出版社，2010年。

8 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9 刘伟：《帝王与宫廷瓷器》，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10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

准先生的研究为最早。韩槐准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涉足于陶瓷外销的研究,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学报》上发表了几十篇专论,如《军持之研究》¹、《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²等。其 1960 年出版的《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³专著,详细列举了自汉至清南洋地区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并结合文献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是研究南洋地区外销瓷的权威资料。

对中国瓷器外销的总论,以陈万里先生《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⁴、《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⁵两文为代表成果。两篇文章分别对宋、元、明、清各时期中国瓷器出口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历代瓷器的对外输出作了简略介绍,并对当时外销瓷的输出路线、类别、外销瓷的产地以及民用瓷器的对外输出进行了概括。

冯先铭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外语方面的优势,对出口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中国外销瓷均有所关注。如《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⁶一文从瓷器外销史料着手,结合国外出土的中国瓷器,论述了由唐至元我国瓷器在日本、朝鲜、菲律宾、文莱、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埃及十个国家的出土情况。《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⁷一文,则详细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自成立以来(1602 年)对中国瓷器的运输、销售情况。《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⁸一文,关注了韩国新安沉船的青瓷问题。特别是其《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⁹一文,对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外销瓷器品类及行销地点进行了纵论,对后来研究外销瓷的学者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故宫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更多机会走出国门,从而对外销瓷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对此进行的研究也更趋细致和深入。其中代表成果有冯小琦《中国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影响》¹⁰,吕成龙《日本所定国宝中的中国瓷器》¹¹、《屋列系好物东方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陶瓷》¹²、《瑞典藏中国清代外销瓷》¹³,王光尧《韩国访瓷札记》¹⁴、《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¹⁵、《以瓷器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层次》¹⁶,等等。

1 韩槐准:《军持之研究》,《南洋学报》第 10 卷第二辑,1960 年。

2 韩槐准:《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南洋学报》第 11 卷第二辑,1960 年。

3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 年。

4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 年第 1 期。

5 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 年第 10 期。

6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 年第 6 期。

7 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 年第 2 期。

8 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1 期。

9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2 期。

10 冯小琦:《中国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影响》,《收藏家》2001 年第 7 期。

11 吕成龙:《日本所定国宝中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1 期。

12 吕成龙:《屋列系好物东方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陶瓷》,《收藏家》2005 年第 9 期。

13 吕成龙:《瑞典藏中国清代外销瓷》,《紫禁城》2005 年第 6 期。

14 王光尧:《韩国访瓷札记》,《收藏家》2001 年第 11 期。

15 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16 王光尧:《以瓷器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层次》,《2012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及文化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年。

四 窑址调查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古陶瓷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文献考据阶段,一为考古调查发掘阶段¹。如前文所述,陶瓷文献资料稀疏零散,间有舛误错漏。因此,构建与研究中国陶瓷史,仅凭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更多要依靠实物。在这方面,以陈万里、冯先铭为代表的故宫学者,较早开始关注了陶瓷实物资料的搜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古代窑址的调查。

故宫博物院 90 年来的古窑址调查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十余年,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陈万里堪称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他为考查浙江龙泉青瓷,自 1928 年起“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并对此进行排比研究,开辟了一条瓷器考古的新途径,从而使我国陶瓷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现代陶瓷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从现存档案记录来看,故宫博物院最早一次有组织的窑址调查,是 1950 年 11 月陈万里、冯先铭、杨忠礼等几位先生对河南省临汝、新安、禹县、鲁山、宝丰诸窑进行了系统调查。此次调查成果,陈万里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禹州之行》²的调查报告。之后的十余年间,在陈万里先生率领下,故宫组织专业人员陆续调查了河南、河北、山西、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份的窑址 50 余处³。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多处已往文献所不载的古代窑址,找到了一些传世器物的确切烧造地点,确定了一些古代窑址的烧造时期,纠正了文献记载当中的一些错误等等,可谓成绩卓著。

第二阶段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冯先铭先生为代表。冯先铭继陈万里之后,成为故宫博物院古窑址调查工作的领军人物。其主持其事的三十余年间,带领同仁陆续调查了河北、山西、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 17 个省及内蒙、广西两自治区的 176 个县市辖区之内瓷窑遗址。根据冯先生自己的总结,此三十余年的窑址调查工作具有以下几方面意义:1. 初步看出中国瓷器的萌芽与形成过程。2. 初步掌握历代瓷窑分布概况。3. 唐宋陶瓷装饰与同时期工艺品之间的关系。4. 填补陶瓷发展历史空白。5. 纠正文献错误。6. 解决大量传世品的具体窑口。7. 促进了专题的研究⁴。

冯先生窑址调查的经历和其对窑址调查意义的认知概括,基本上建构了一整套完备的研究方法、思路乃至理论体系。此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对后来的古陶瓷研究具有示范指导意义。可以说,进行古窑址调查,了解各地瓷窑特点和生产、遗存情况,如今已成古陶瓷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第三阶段,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以冯小琦研究员为领队,新一代故宫学者在前辈基础上继续窑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截至目前,共调查全国范围内的古窑址 200 余处,采集了窑址标本 3 万多片。

相对于前人历尽艰辛、筚路蓝缕的窑址标本采集,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这些标本予以整理、展

1 李辉柄:《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前言,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2 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3 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总第二期。

4 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2期。

示、出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之际，故宫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展厅举办了“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展”专题展览，共展出自唐代至清代的各类窑址标本 3400 余片，几乎囊括了历史上所有重要窑口的瓷片标本。故宫几代学者积数十年之功采集的标本得以集中展示，令人叹为观止，展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和社会观众的一致认可。此外，故宫出版社正计划按省份地域将这些窑址标本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已出版完成河南、河北、浙江等地区的窑址标本图录多部。展览的成功举办和一系列图录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故宫博物院在窑址标本收藏、展示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也树立了故宫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五 陶瓷考古学

与实地走访、采集标本为主的窑址考察不同，现代考古学是以古代人类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对这些遗址、遗迹、遗物等文化遗存进行科学研究。具体到陶瓷考古学，主要涉及古窑址或墓葬等文化遗存，对其中出土的陶瓷器文物进行排比研究。关于陶瓷考古的开展，肇始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1926 年由李济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出土的主要遗物即为陶器。

由于考古学学科壁垒森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资质要求，与故宫的博物馆属性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因此，故宫作为博物馆，很长时间内没有独立从事考古发掘的资质，只是个别专家学者参与过各地的窑址考古发掘。如王光尧、冯小琦、董健丽、蔡毅、黄卫文、赵小春、任秀侠、李卫东、高晓然、韩倩、冀洛源、单莹莹、唐雪梅等研究人员，曾先后参与过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江西景德镇丽阳瓷器山明代窑址、江西景德镇丽阳碓白山元代窑址、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河北曲阳定窑窑址、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湖北丹江口市青塘村明代官窑琉璃窑址、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等各处考古工地的发掘整理工作。同时，故宫从事陶瓷考古的学者也将视野拓展到海外，如王光尧研究员参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的肯尼亚陆上考古项目，调查该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

2013 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考古研究所，标志着故宫考古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认识考古学研究成果对于故宫博物院发展的意义方面，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考古学权威学者张忠培先生指出，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并且把最新考古成果引入故宫，“表明故宫博物院开始走出昔日皇宫的院墙，关注早期瓷器史的研究、关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追踪学术发展方向的决心，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发展有较大的意义”¹。

故宫考古所成立之后，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多项考古发掘工作，收获颇丰，成绩显著。如针对紫禁城内部南三所工地、南大库消防管道改线工程工地、慈宁花园热力电力管线改造工程工地等三处发现古代建筑遗址的施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玉器等文物遗存。此外，2014 年开始，在王光尧研究员主持下故宫参与了印度奎隆古港及帕特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重点关注了该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物。目前，故宫考古所与江西景德镇市、湖北丹江口市等地联合开展的窑址考古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¹ 单霁翔：《在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12 月 17 日。

六 陶瓷科技与实验

陶瓷科技考古是科技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是通过利用元素分析手段测试陶瓷器胎体、釉料以及胎釉结合部的成分，利用测温技术分析陶窑温度和古陶瓷烧成温度，利用物相鉴定方法考察古陶瓷中物相构成，并结合传统类型学方法，探讨中国古代陶瓷器发展脉络和技术路线的一门新兴学科。陶瓷科技考古的研究，能够为考古学和科技史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有益信息。

将科技检测技术运用到陶瓷研究领域，肇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周仁、游国溥等学者为代表。由于博物馆属性的限制，故宫博物院在科技检测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古陶瓷研究中心，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并投入上千万资金引进配置了激光拉曼光谱仪、能量色散型 X—射线荧光光谱仪、可移动式实体显微镜等一批世界先进的测试仪器，以期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是。

运用科学技术方法研究古陶瓷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要建立庞大的标准数据资料库。故宫博物院陶瓷类藏品丰富，各个窑口及历代传世官窑品种齐全，这为进行科技检测、创建标准数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实验室建立短短十年时间，即完成了《元明清建筑琉璃瓦的研究》、《清晚期粉彩瓷中红、黄、白几种颜料的拉曼光谱分析》等国家级重大课题，参与完成了宋代定窑、宋代官窑、汝窑、钧窑等课题研究。

论文方面，实验室研究人员已发表的论文成果在 50 篇以上。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元明清建筑琉璃瓦的研究》¹、《清晚期粉彩瓷中红、黄、白几种颜料的拉曼光谱分析》²、《定窑遗址考古出土制釉原料的探析》³、《EDXRF 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无损分析》⁴、《EDXRF 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及明清仿官窑瓷器的再研究》⁵、《杭州南宋遗址出土官窑类瓷片的科技研究》⁶、《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青瓷的拉曼光谱无损分析》⁷、《清凉寺窑出土汝官瓷与民汝青瓷胎釉配方及工艺的对比研究》⁸、《古代钧瓷“蚯蚓走泥纹”的成因探析》⁹等，以科技手段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学界一些既有的定论进行实验和再论证，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促进了古陶瓷学科向深度、广度发展。

七 陶瓷资料整理出版

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数量近 36 万件，其中约 90% 为历代官窑器。可以说，在藏品数量与质地方面均为全国乃至世界之最。如何很好地将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将文物信息公之于众，以利全社会范围对此更好地利

- 1 苗建民、王时伟：《元明清建筑琉璃瓦的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 108～115 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年。
- 2 苗建民等：《清晚期粉彩瓷中红、黄、白几种颜料的拉曼光谱分析》，《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 441～446 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
- 3 康葆强、苗建民、秦大树：《定窑遗址考古出土制釉原料的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 年第 9 期。
- 4 李合、徐巍、李卫东、梁国立、苗建民：《EDXRF 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瓷器无损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 5 期。
- 5 李合、吕成龙、陈铁梅、苗建民：《EDXRF 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及明清仿官窑瓷器的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 年第 2 期。
- 6 李合、丁银忠、沈琼华、沈岳明、唐俊杰、邓禾颖、陈铁梅、王光尧、苗建民：《杭州南宋遗址出土官窑类瓷片的科技研究》，《南方文物》2013 年第 2 期。
- 7 赵兰、苗建民等：《对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官窑青瓷的拉曼光谱无损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年第 5 期。
- 8 丁银忠、李合、孙新民、王光尧、陈铁梅、苗建民：《清凉寺窑出土汝官瓷与民汝青瓷胎釉配方及工艺的对比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3 期。
- 9 李媛、苗建民、孙新民、冯小琦、贾翠等：《古代钧瓷“蚯蚓走泥纹”的成因探析》，《故宫学刊》2013 年（总第十辑）。

用、研究,是故宫陶瓷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项工作。这种对院藏陶瓷进行整理、断代、编辑到最终出版的工作,看似简单基础,实则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亦是另一种形式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图录类书籍的出版方面。

为此,故宫博物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了出版社,出版以故宫藏品为主的文物专业类书籍。30 余年来,出版的陶瓷类图录、研究论文集、专著等等书刊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一大批陶瓷图录类书籍的问世,将久藏深宫的陶瓷珍品公之于众,深受同行学者和广大陶瓷爱好者的欢迎。其中重要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陶瓷卷》、《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陶瓷类》、《故宫陶瓷图典》、《故宫博物院藏元代瓷器》、《明初青花瓷》、《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清代御窑瓷器》、《官样御瓷》、《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贋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古陶瓷资料选粹》、《孙瀛洲的陶瓷世界》、《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定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故宫博物院藏慎德堂款瓷器》、《大雅斋瓷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民窑瓷器》、《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已出版河南卷,河北卷,浙江卷,北京、山东、陕西、宁夏、辽宁卷),等。

这些书籍的出版,极好地介绍和推广了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同时,对于图录文物的选取、甄别、鉴定、分类以及文物说明的撰写等等,亦包含着故宫几代陶瓷学者的研究成果。

八 小结

将古代陶瓷艺术视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进行研究,大概始于宋元时期。其中蒋祈所著的《陶记》,第一次系统记载了景德镇陶瓷烧造的历史,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景德镇陶瓷工艺、艺术、经济诸方面的概况,堪称陶瓷研究专著的开山之作。然而,同时期及后世有关陶瓷的文献,大都是文人笔记或地方志中的零星记载。这种情形直至清末民国,仍未有大改观,除了《南窑笔记》、《说陶》、《景德镇陶录》、《陶雅》、《饮流斋说瓷》等几部介绍性书籍之外,难见对陶瓷类文物真正有所建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陶瓷研究在中国传统士人文化体系中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

回顾故宫博物院 90 年来古陶瓷研究的发展脉络,学界对于古陶瓷的关注和研究亦是逐步升温。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物》、《考古》等文博类权威期刊中,有关陶瓷研究的文章比重甚低,偶见的研究文章大都出自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等故宫前辈学者之手,内容以介绍藏品、鉴定真伪、调查报告等说明性文字为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陶瓷类器物逐渐受到收藏市场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相应走向深入。学者在专注于器物鉴定、窑址调查之外,开始关注陶瓷史、陶瓷文化史的建构等宏观层面,注重发掘陶瓷的历史文化内涵。近 20 年来,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力量的加强,陶瓷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日趋多样化。学者更加具有国际视野,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科技实验乃至人类学等多重手段,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陶瓷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精彩纷呈。

可以说,古陶瓷研究逐步从“冷门”走向了文博领域的“显学”地位。这种地位的提升并非只是眩人眼目的“七宝楼台”,它饱含着故宫陶瓷学者取得的每一项研究成果,凝聚着几代研究者们不懈追求和艰辛努力的心血结晶。

